

我的叔叔费孝通

费皖◎著

My Uncle Fei Xiaotong

费孝通（1910~2005）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



我的叔叔费孝通
My Uncle Fei Xiaotong

费皖◎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费皖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叔叔费孝通/费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05-06882-0

I. ①我… II. ①费… III. ①费孝通 (1910~2005)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475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8

插 页: 1

字 数: 2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喃 张 洪

装帧设计: 郝 强 路 征

责任校对: 高 辉

书 号: ISBN 978-7-205-06882-0

定 价: 28.00元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去世。

费孝通首先是我的叔叔，~~费孝通~~是人们叫惯了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兄弟姐妹当中，我父亲是老大，他是老五，所以我也叫他五叔。对于五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了解得并不多，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我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来二去，或许也可说是耳濡目染，逐渐懂得和明白了一些他对人和做事情的道理，对他便更亲近和尊敬。

五叔虽已离我而去，但是在我心里，他俯身在堆满书籍、报章的书桌前写作的样子；他的一口吴侬乡音依然那么清晰，萦绕在耳，真真切切——像是在讲述着什么，交代着什么事情……

写在前面

一次偶然的机，我陪叔叔一起出差。那是 1983 年的事。这年 3 月，叔叔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7 月的时候，黑龙江省卫生厅通过我的一位同学发出邀请，要孝通叔叔到哈尔滨去讲学。我的这位老同学面子真大。或许因为有老同学这层关系，叔叔想到了我，并要我和他走一趟，在旅途中也好照顾一下。陪他出差，我说这事简单，买两张火车票走就是了。不想叔叔摇摇头说：不行、不行，现在不自由了，不像过去，现在一行一动都要报告的……

那时叔叔正在为重建社会学和搞他的学术调查忙碌着，同时因为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所以盟内的工作也很多。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以后，中国民主同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项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次叔叔去哈尔滨，除了到卫生厅讲学，和黑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相互沟通之外，还有拜访当地民盟同志的任务。所以在出差前，我按照他的吩咐先到民盟中央机关办一些必办的事情，这一来和民盟中央办公厅的金若年同志接上了头。金若年是民盟的老人儿，解放前就在民盟工作，跟我父母都熟悉。几次接触之后，他索性建议我到民盟机关来工作。我那时有几种选择，尚在犹豫当中，考虑再三，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陪叔叔从哈尔滨回来后，我下决心调到民盟，

成了民盟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创造了许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形式，民盟中央开展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民盟中央于1988年成立了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盟中央领导同志在做区域经济研究时提供服务，以及处理一些相关事务。我便最终落脚在这个委员会。

从1982年起，叔叔在作学术研究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社区调查方面，紧密地和区域战略规划研究结合了起来，同时，一直在考虑为“民盟怎样利用好自身的智力优势，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富有成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找一条路子。当他担任了民盟主席以后，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民盟的工作结合起来，发动全国各地有条件的民盟组织，和他一样协助政府搞调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建议。作为盟中央区域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就跟着他一起忙活。

后来，为了准备出版《费孝通文集》，领导又指派我负责整理叔叔的文章。这个工作逼得我不得不把收集到的、几十年来他所写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尽管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并没有费脑筋去思考，甚至有的还读不



在《费孝通文集》首发式上。

很懂，但是却让我了解了他从 14 岁开始到 80 多岁的这段时间里都“想”了些什么。

1999 年 10 月，叔叔 90 岁生日前夕，500 多万字的《费孝通文集》（14 卷本）终于问世，这是我们几个参与编辑这套文集的同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2001 年和 2004 年，又分别整理出版了《费孝通文集》第 15 卷和第 16 卷。

从 1983 年算起，20 多年来，我有机会经常陪伴在叔叔身边，看他做事，听他讲话，读他的文章，不仅增长了知识，也更加深对他的了解，感情一天一天亲近。



◀ 《费孝通文集》出版后，责任编辑给叔叔送来样书。

目录

写在前面 | 01

如磐岁月 | 01

- 一、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02
- 二、“三凤齐飞” 07
- 三、思想改造 12
- 四、经历反右 19
- 五、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43
- 六、说“家世” 53
- 七、叔叔听我讲故事 67
- 八、“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74
- 九、孝通婶妈 78
- 十、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88
- 十一、干校生活 98

老树新枝 | 121

- 十二 “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 122
- 十三、“查三代容易做，但一个人的本领没法从三代上查出来” 131
- 十四、“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国际竞争准备实力” 135
- 十五、“上书紫光阁” 141
- 十六、叔叔的“本领” 146
- 十七、“石碑埋又立” 156
- 十八、到六巷 164
- 十九、“哪儿穷就去哪儿” 172
- 二十、广宗扶贫 178
- 二十一、希望一生中能够亲自去拜访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 187
- 二十二、关于“百分之百”的对话 204
- 二十三、家乡的凤尾菇和卡拉汉访苏北 209
- 二十四、真秘书，假秘书 214
- 二十五、遭遇“非典” 222
- 二十六、最后冲刺 263
- 二十七、谢幕 273
-

如磐岁月

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三凤齐飞”

思想改造

经历反右

我们费家还没有当工人的，你是第一个，不简单
说“家世”

叔叔听我讲故事

“要不要去苏州的票？”

孝通婶妈

给潘公公“看病”，替浦熙修买“砒霜”

干校生活

一、十一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

为什么到 11 岁时才知道有个叔叔叫费孝通呢？这是因为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叫棉兰的地方，在国外我们家没有亲戚。再加上我出生那年，正赶上“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局面很乱。等我长大一点，4 岁那年，父亲因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荷印殖民政府（那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驱逐出境，全家被迫搬到了新加坡。但是还没等我们安顿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长驱南下，很快就打到新加坡附近。妈妈只好带着我们姐弟四人离开新加坡，开始了逃难生活。记得在去爪哇巴城（雅加达）的路上，我们乘坐的轮船，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旅客都躲到餐厅的桌子下面，在爆炸声中，轮船激烈地震颤着。时间不长，空袭过去了，大人们纷纷议论，有人说这几架飞机大概不是专门来炸我们的，要不然不会扔这么几颗炸弹就飞走了。但是就这几颗炸弹，也把船头甲板炸了个大窟窿，还炸死了两名水手。我还依稀记得，这两个水手是用白布裹好后，从船舷上被推到海里的。妈妈说这是“海葬”，在大海上死的人都这样。我们到巴城不久，日本人也打到爪哇。妈妈又拉扯着我们逃到石叻班让，与先期流亡到那里的父亲会合。

石叻班让是苏门答腊东海岸边上的一个小岛，离新加坡不很远。日本人因为兵力不够用，没有在岛上驻军，不过他们隔一段时间会到岛上“巡视”一下，或者来抓人，我就曾看见日本兵把和我们一起逃难的王叔阳和郭后觉两人抓走（后来郭先生死在集中营里），据说是因为他们都戴眼镜，看样子像知识分子。父亲也戴眼镜，那天恰巧不在，没有被抓。后来只要听说日本人来，他就赶紧躲到山巴里去。日本人上岛“巡视”的时候，会有人组织一些群众到路边“欢迎”，小孩子是一定要去的。欢迎的时候人们要不停地喊“邦塞”，邦塞在日本话里是万岁的意思，这两个字的发音恰好和当地华侨说的福建话“拉屎”的发音很像，所以每次我大声喊“邦塞”的时候，心里是在骂这些小日本“吃屎去吧”。



▲
1948年6月回国前夕，我们班同学和老师为我送行时拍的照片。前排左一坐着的小孩就是我。

石叻班让虽小，却有一所小学，妈妈把我送去那里上学。课程里有一门日语课，从“阿义务谗哦”学起，我很不情愿学这东西，所以每到上日语课时，就故意不听、不念。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却会有这样强烈的“反日”情绪，大概是受父母和整个身边环境影响的吧。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但是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了内战。印尼这里也不平静。日本刚一投降，印尼就宣布独立，准备接管政权。同时，作为盟军的荷兰军队，也想趁此机会卷土重来，恢复战前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尼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加上荷兰殖民势力的侵入，造成了战后一段时期，印尼局势非常混乱。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沦陷时流亡到苏门答腊的胡愈之^①、王任叔^②等人先后抵达棉兰。我父亲也回到棉兰担任华侨总会秘书主任。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印尼的华侨中间，明显地分成支持共产党的“民主派”和追随国民党的“反动派”。棉兰华侨中的进步人士，在胡愈之、王任叔的领导下，由我父亲和邵宗汉等人出面，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后经民盟总部批准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通过民盟，团结广大侨胞，与追随国民党的“反动派”进行斗争。

为了打击民主派，国民党驻棉兰领事勾结当地政府，于1947年8月，将王任叔逮捕（胡愈之已先期去了香港），关押在棉兰海口集中营，企图引渡到国内。后经各方营救，荷印当局把他驱逐出境，这样王任叔去了香港。一年后，荷印政府故伎重演，把父亲和邵宗汉驱逐出境，同时通知说，英国政府不准你们在英属殖民地登陆。也就是说，父亲和邵先生离开棉兰后，不能去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一来如果回国，只能在国民党盘踞的汕头上岸了，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事情紧迫，父亲和邵先生商定，马上跟香港民盟总部联系，同时打电报把情况告诉在北平的费孝通。

1948年8月，当我们拿着去汕头的船票，登上驶向中国大陆的“万福士”号邮轮时，还没有得到来自大陆的任何

①胡愈之(1896—1986年)，作家、翻译家、新闻出版工作者及国际问题专家。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盟。1940年奉命赴新加坡，在侨胞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1946年在南洋建立民盟组织。翌年，召开了民盟马来亚支部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任支部主任委员。他还是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民盟中央主席史良逝世，他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②王任叔(1901—1972年)，笔名巴人，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和翻译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主持过社会科学大学。1941年奉周恩来指示去美国办《华侨日报》，后因护照难办而改去新加坡。与胡愈之并肩战斗，一同流亡印尼。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第一任大使出使印尼。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等职。1960年“反右倾”时，被定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代表人物，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期间屡遭批斗，几次因脑血管昏厥。1970年被遣返原籍奉化农村。由于得不到医治，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由精神分裂症发展到癫狂的程度。1972年含冤而歿。1979年终得平反。



▲
我们全家和刘岩（王任叔夫人，前排右一）、邵宗汉（前排右二）在“万福士号”甲板上合影。

消息。轮船经过新加坡时，因为要在港口过夜，新加坡警方如临大敌，把父亲和邵先生押上岸，在牢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快开船时才把他们送回来。就在“万福士”驶离新加坡不久，船长突然通知父亲：你们可以在香港登岸了。后来，当提起这段往事时，父亲说：上了万福士号，心一直悬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船长说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才放下心来。也不必多问，心里明白就是了。^①

船到香港，民盟总部的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到码头来接我们。后来听说万福士号抵达汕头时，国民党特务早在码头“恭候”，却扑了空，胡乱抓了几个人了事。

我们一家在香港暂住下来。父亲被安排到达德学院教书。但是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是困难的，于是妈妈把我和哥哥送到上海霍叔叔家，把大姐、二姐送到北平的青叔叔和孝通叔叔那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费振东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十个弟弟妹妹。老二是姑姑费达生，老三费青，老四费霍，老五费孝通。在孝通叔叔十几岁的时候，

①“我的大哥费振东原在印尼做华侨中的爱国民主工作，民盟负责人之一，受荷兰殖民政府拘捕，并接受国民党领事要求，押送台湾，同时拘捕的有邵宗汉（现在外交部）。我得信，就托当时在北平的一个美国人巴格（Borg）去电香港大学校长的女秘书，设法在彼等经过香港时截救。港大校长出面保彼等在港登陆。”——摘自“文革”时费孝通的《综合材料》手稿。

我的祖母病故，祖父续弦后，又育有费开、费定、费球、费中、费璇、费奇六个子女。妈妈在提到这些叔叔姑姑的时候，特别提到孝通叔叔文章写得好，年轻人都喜欢看 he 写的东西，如果报纸上登了他的文章，这天的报纸就卖得快。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孝通叔叔会写文章。

那是 1948 年的事。当时我 11 岁。

二、“三凤齐飞”

父亲在香港滞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第二年（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蒋介石宣布下野；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建立新政权了。3月，父亲和其他人一起，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乘船离开香港，经塘沽回到了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

这时候我和哥哥在上海霍叔叔家已经住了大约一年。上海一解放，妈妈就赶来接我们，乘坐解放后从上海开出的第一列火车回到北平，一家人团圆了。我和哥哥一到北平，父亲就带我们去沙滩中老胡同看望青叔叔，又去清华园胜因院孝通叔叔家。和这两位叔叔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两位叔叔摆满一摞摞书籍的房间，似乎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忘不了的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时会用一个小小的喷雾器往嘴里喷点药，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有哮喘病的缘故，话说多了会感到憋气。大概是家族遗传，我也有这个毛病，知道喘起来是很难受的，看到这样小巧的喷雾器还真羡慕。可恶的哮喘病一直拖累着两位叔叔。尤其是青叔叔因为这个病，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十分痛苦。孝通叔叔则在上世纪50年代末，接受一种从苏联传入的“组织疗



法”——在肚皮下植入一只小鸡胚胎。但是小鸡胚胎植入以后，病没有治好，从此肚子上的脂肪反倒越积越多了。

父亲到北平后，和三弟、五弟相聚，兄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一次，三人去拜望来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亚子先生是我祖父的好朋友，他的母亲费漱芳是费家一位远房姑奶奶，所以和费家还沾点亲戚，论起来亚子先生应该是父亲他们的姑舅。见面后亚子先生很高兴，即席赋诗相赠。

▲
三兄弟合影（左起费孝通、
费振东、费青）。